

文史論集

郭沫若

文史論集

郭沫若著

出版說明

这个集子收輯了作者自解放以来到一九六〇年三月为止的部分論著。除了有关历史研究的理論和专题述作以外，也选輯了一些討論文学理論和文学遗产方面的文章。已經編在专集里的文章，如《奴隶制时代》中的各篇，則未收入本书。本书在付印前，經過作者的校閱，有些文章作了一些修改。

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1960年11月

目 录

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	1
关于厚今薄古問題.....	11
給北京大学学生的一封信.....	17
坚持文物事业的正确方向.....	19
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設高潮	24
討論紅与专.....	29
关于紅专問題及其他.....	33
学习毛主席.....	45
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	49
烏云消散,太阳更加光芒万丈	52
就目前創作中的几个問題答《人民文学》編者問.....	57
就当前詩歌中的主要問題答《詩刊》社問.....	72
进一步展开“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84
坐地、巡天及其他	89
給《史学》編輯部的一封信.....	92

* * *

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鉄器出土.....	95
-------------------	----

——关于古代分期問題的一个关键

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	99
------------------	----

——古代史分期爭論中的又一关键性問題

略論汉代政权的本质.....	106
——答复日知先生	
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問題.....	117
《侈靡篇》的研究.....	127
《太史公行年考》有問題.....	168
关于司馬迁之死.....	173
替曹操翻案.....	176
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	193
——序《蔡文姬》	
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200
再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210
三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213
四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223
〔附〕林景熙的《蔡琰归汉图》	
五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237
六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240
为“拍”字进一解.....	247
跋《胡笳十八拍》画卷.....	255
《管子集校》叙录.....	257
序《〈盐鉄論〉讀本》.....	272
影印《永乐大典》序.....	278
《秋瑾史跡》序.....	282
《柳亚子詩詞选》序.....	284
* * *	
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	288
〔附〕关于晚周帛画的补充說明	

由寿县蔡器論到蔡墓的年代·····	299
信阳墓的年代与国別·····	305
《矢殷》銘考釋·····	308
盞器銘考釋·····	312
《保卣》銘釋文·····	320
《者切钟》銘考釋·····	323
《輔师菱簋》考釋·····	328
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	333
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釋談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簡化·····	344
《弭叔簋》及《甸簋》考釋·····	347
安阳圓坑墓中鼎銘考釋·····	352

插图目录

图版1	晚周帛画·····	298—299
图版2	彩色漆画奩·····	298—299
图版3	蔡侯鍾·····	304—305
图版4	蔡侯編钟一·····	304—305
图版5	蔡侯編钟二·····	304—305
图版6	1, 2. 蔡侯編钟八 3. 編钟三 4. 編钟四·····	304—305
图版7	1. 鼎殘文 2, 3. 蔡侯簋 4. 蔡侯戈·····	304—305
图版8	蔡侯卢及銘文·····	304—305
图版9	吳王光鑑·····	304—305
图版10	吳王光鑑銘文·····	304—305
图版11, 12	番簋編钟及銘文·····	306—307
图版13	1. 馬形盞尊 2. 盞尊·····	318—319
图版14	1. 馬形盞尊盖銘文 2. 馬形盞尊第一器紋飾·····	318—319

图版 15	1. 馬形盞尊銘文 2. 馬形盞尊第二器盖銘文	318—319
图版 16	盞尊銘文	318—319
图版 17	1. 盞方彝甲 2. 盞方彝乙	318—319
图版 18	盞方彝甲正面紋飾	318—319
图版 19	盞方彝甲銘文	318—319
图版 20	盞方彝甲盖銘文	318—319
图版 21	盞方彝乙銘文	318—319
图版 22	盞方彝乙盖銘文	318—319
图版 23	保卣	322—323
图版 24	保卣銘文	322—323
图版 25	輔師菱簋	330—331
图版 26	1. 輔師菱簋口下花紋环帶 2. 輔師菱簋銘文	330—331
图版 27	鄂君启节 (甲、乙)	342—343
图版 28	方鼎	346—347
图版 29	1. 大鼎 2. 方鼎銘文 3. 大鼎銘文	346—347
图版 30	1. 叔德毀銘文 2. 德毀銘文	346—347
图版 31	1. 德毀 2. 叔德毀	346—347
图版 32	弭叔鬲及銘文	350—351
图版 33	弭叔簋及銘文	350—351
图版 34	1. 弭叔盥 2. 銅壺 3. 弭叔盥銘文	350—351
图版 35	匍簋及銘文	350—351
图版 36	1. 安阳后岡的圓坑墓 2. 安阳后岡圓坑墓中 出土銅鼎	354—355
图版 37	安阳后岡圓坑墓中出土銅鼎銘文	354—355
图版 38	安阳后岡圓坑墓出土銅器 (1. 銅卣 2. 銅鏃 3. 銅刀)	354—355
图版 39	安阳后岡圓坑墓出土銅器 (1, 2. 銅戈)	354—355

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

——答《新建設》編輯部問

一 历史研究的方向問題

在今天，作为学术研究总的方向來說，應該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史学研究的任务自然也不能例外。方向已确定了，問題是如何去走，亦即方法問題。这一点，同样也是很明确的，我們必須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即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研究也应该走群众路綫，集体地从事有計劃的分工协作。这样就可以做到“多快好省”。

方向确定了，方法也找到了，那么，在史学領域里，要搞些什么呢？通史應該搞，专业史、断代史也应该搞，党史当然更应该搞。此外，世界史、亚洲史的研究也要积极开展。专业史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思想史、經濟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在文学史中又可分为詩歌史、戏剧史、小說史等。特别是工艺史，这是劳动人民进行創造性劳动的历史的一部分。劳动人民創造的工艺品，丰富多彩，值得我們注意。例如剪紙的花样就很多，其他如用草木編制的、象牙雕刻的各种工艺品，花样之多且巧，足以惊人。但是，研究工艺发展的历史，我們还未予以充分注意，今后應該重視起来。

一部中国通史，是中国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史。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編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这是大家所一致期待

的。当然，中国通史的著作，现在并非没有，但我们希望能有更好的通史编印出来。除通史外，专业史、专题史（如对某一个历史人物、某一件历史事实的研究）、特别是各民族的发展史等等，都应该注意。过去中国史书上所反映的中国历史，对于少数民族很少注意，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各民族的发展和贡献，它们同汉族的关系等等，都应该好好研究。

通史要搞，断代史也要搞。断代有两种方法。旧方法是以朝代段落，譬如研究夏、商、周、秦、汉……等等朝代的历史，研究这样的断代史，本身并不能说有什么不对，重要的是看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去研究。只要立场观点方法对头，历史上的某一个人物、某一件事实，尚且应该研究，为什么一个朝代的历史就不可以研究呢？断代的新方法是根据社会发展的五个时期来划分段落。应该研究这样的断代史，当然更不用说了。

近几年来，工矿单位日益增多，特别是人民公社，更是最近出现的崭新的事物。很多人在编写工矿史、公社史，这是很好的现象。在工矿和人民公社中，真是大有可为，有很多出色的、可作为典型的单位。大型工业如鞍钢、开滦，农业如安国、遂平，乃至如毛主席称赞过的河北安平由三户贫农搞起来的“穷棒子社”，都可以成为典型。把这样的典型单位的发展过程写出来，对其他单位可起示范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教育意义。所以编写工矿史、公社史，或者工矿、公社之外的其他企业或机构的历史，并且尽可能把它们写好，这是很有价值的。这的确是历史研究的新的方面。但我希望不要把写工矿史、公社史等和搞通史、专业史等对立起来。工矿史、公社史除提供典型之外，主要在提供材料，需要我們在这基础上再加以总结、提高；使局部的东西成为更全面的東西。通史、专业史还是需要的，工矿史、公社史不能代替通史、专业史，但将来的

通史、专业史的撰述却离不开工矿史和公社史。

工矿史、公社史，由什么人来写比较合适呢？我看可由各个单位自己来搞。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他们完全有力量来搞。但也无妨由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干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下去帮助他们搞。历史专业干部下去，用较多的时间，比方三年左右，帮助工农群众写各该单位的发展史，这是值得提倡的。工矿、公社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它们的历史也就不可能在一次就写完。因此，下放的历史专业干部需要有定期“瓜代”的制度，轮流下去，继续不断地帮助编写。这样，既便于写出典型单位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训练历史专业干部，使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

现在中国科学院有历史研究所，还有考古研究所。设立专门的研究所来研究历史和文物，这在我国古代是没有的。中国古代只有官方的修史馆或半官方的、私人的修史集团，他们的任务，着重在编修前一代的历史。今天历史研究所所做的主要是从文献中研究以前的历史，我认为，业务范围还可以扩大。中国古代修史的优良传统有继承的必要。历史研究所的工作，应该侧重到修史方面来。在我国，有很多历史应该写，而还没有组织人来写，即使在写也还没有写出较好的著作来。例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省港罢工、红军长征……等等，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可是至今还没有有系统地加以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进行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也还没有在科学的基础上写出著作。这都是历史工作者应该作的。

以任务带动科学研究，是个好办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已经这样作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应该如此。在史学工作方面，我觉得可以组织力量，规定任务，来进行工作，譬如成立小组，编写抗美援朝史之类，这样做，既可以训练人才，也能发展史学。如果脱离

任务，孤立地进行研究，是不容易搞出成绩来的。最近，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院外有关单位合作，集体地编写中国通史，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除集体编纂外，我们也应该欢迎个人撰述。史学工作中也尽可以百花齐放，只是集体编纂的工作，我们以前忽略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二 打破王朝体系的问题

旧时代的史书，是替帝王将相作家谱，那种编写方法，无疑地是应该抛棄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应该打破封建王朝体系，这是对的。

但打破王朝体系，并不是要求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抹掉。事实上既存在过朝代，如何能抹得掉呢？我们要打破的是旧的历史观点、封建正统观点、专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把王朝抹掉。如果我们的立场、观点不对头，即使抹掉了王朝，也依然写不出为今日所需要的历史著作来。

历史研究的总的方向和方法，前面已经谈过。在这个总的方向和方法的指导下，研究某一个朝代的历史是允许的。这些朝代的称号、年号等等，也没有删掉的必要。在我们看来，夏、商、周、秦、汉……等不过是A、B、C、D……等符号；帝王的称号，也犹如张、王、李、赵……等姓氏一样。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国号、庙号、年号，几千年传下来，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沿用它们，实际上也只是当作一种符号罢了。至于历史上的编年，如果单提年号，如说建安若干年，或贞观若干年，人们不容易马上知道究竟距今多少年；如单提公元若干年，也不容易马上知道究竟是何朝代，因此，以采用双轨制为宜，即把王朝纪年和公元纪年同时并列，这对读者是很方便的。

历代的帝王，都是有姓名的，但一般人只記得他們的姓，至于名字，就很少有人說得出。有的历史书上不写帝王的称号（如明成祖、宋太宗等）而直接写他們的名字，这样反而使人不懂。我們在历史著作中称他們为帝，并非表示對他們尊敬；称他們为太祖太宗，也并非就真是我們的祖宗。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符号而已。要从中国历史上把王朝的許多称号完全抹去，反而有很多不方便。

历史是发展的。过去，許多人认为只有古代才是盛世，有人推到唐尧、虞舜，有人推到伏羲、神农。在外国也有类似的情况。直到馬克思主义出現以后，人們才弄清楚历史是发展的。不仅社会的历史是发展的，而且生物的历史、地球的历史、整个宇宙的历史也都是发展的。总而言之，是后来者居上，現在比过去好，比过去进步。譬如奴隶社会总要比原始社会进步，封建社会总要比奴隶社会进步。我們如果能够站在历史发展的观点上，看到这一个阶段总比前一个阶段进步，这样就能够从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所处的那个阶段上去研究問題，比較容易評定它們的价值。相反的，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那么，可以写的，可以肯定的，就不多了。而这样做，即所謂反历史主义，显然是不对的。

总之，中国历史上既有王朝存在，在史书中就不好不提。写通史是这样，写专业史也是这样。前面已經讲过，旧的断代研究應該予以保留，当然也可以把它們包括在新的断代（以社会发展五大分期为段落）研究中去。

从新的历史观点出发，固然應該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統治阶级的活动也就不能不写。統治阶级的活动对当代的人民有利，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利，我們就肯定它；相反的，我們就否定它。但否定它并不是抹杀，而是批判。所以統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使有时是狗咬狗，如果关

系重大，也值得写。例如西晋的“八王之乱”完全是狗咬狗，但招致了“五胡乱华”，甚至南北朝好几百年的分裂；完全不提，那是不妥当的。

三 史料、考据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

研究历史当然要有史料。馬克思主張尽可能地占有大量資料，也說明資料对科学研究的重要。占有了史料，就必須辨別它的真假，查考它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番檢查的功夫，也就是所謂考据。这些工作是不可少的，是應該肯定的。但它毕竟是历史研究的初步阶段。沒有史料固然不能研究历史，专搞史料也决不能代替历史学。过去，旧的史学工作者停滯在这初步阶段，就认为很够了，說什么整理史料即历史学，这显然是錯誤的。

中国的史料很多，除去正史、野史这些文字記載外，还有許多实物史料，如出土的文物等。建国十年以来，发掘出的文物，包括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就达几百万件之多。另外，在海外也有許多資料，有的和中国直接有关，有的虽无关系，但也可用来作比較研究。譬如我們研究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就要比較地研究古希腊、羅馬的史料。恩格斯就曾利用摩尔根关于美洲紅色人种的資料研究国家、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地上地下，海內海外，这样浩如烟海的史料，我們要加以整理和分析，当然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而應該分分工，排排队，搞出些有权威性的工具书来。这对历史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在这方面，我們作的还很少。这是一件大工程，需要大家分工合作。

占有史料以后，要加以整理分析，这是历史研究的第二步。这就要求我們在那么繁多的史料中分清主次。在史料中，有重要的、次要的，也有无关重要的。我认为，对民族的发展、經濟的发展、文

化的发展等有关的史料是头等重要的，应该尽量搜集，优先整理。这方面的史料，不完全限于文字記載上的，劳动人民直接創造的东西，比文字記載还可靠。对沒有文字記載的时代，就要靠石器、陶器等来研究。

历史发展中的經濟現象和文化現象，在过去的史书中是不大被人注意的。在古代的史学家中，司馬迁比較重視这方面的材料，他的《史記》中就有八书主要記載文化，就中如《平准书》更特別叙述財經方面的历史。以后的有些断代史和通史（如《通鑑》之类），对这些問題就很忽視了。我們今天研究历史，应该特別重視有关經濟方面的問題，这些方面的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应该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旧的历史学者，对史料讲究所謂“四把钥匙”，即年代、职官、地理、目录。从前面所讲的观点来衡量，就不可能认为都是“钥匙”了。当然，我們也不好說这些都值不得研究。其实某一項史料的重要与否，要看它对問題解决的需要程度而定。例如“年代”，如果不是孤立地、事无巨細地去考証它，那也不能籠統地說弄清楚年代就沒有用，古代史分期問題就是“年代”問題。“职官”也是如此。譬如《周礼》上記載周朝按天、地、春、夏、秋、冬分設六官，官各設六十职，共三百六十职，恰合黃道周天三百六十度和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数。这显然是后来有些天文知識的人搞出来附会到周朝的制度上去的，实际情况当然不会是这样。如果肯定《周礼》是西周的典礼，那就会把西周說成为已进入封建社会了。“地理”，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向来是很密切的，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它所在区域的地理条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尽可以看出历代社会經濟和文化发展过程的概况。至于“目录”，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具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

所以搞这些史料，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不一定是“钥匙”。

当然，史料中有不少是过于繁琐的、无关重要的东西。例如，有人考证洪秀全有没有胡子，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不过，如果有人要搞，我认为也可以由他搞去，这总比什么也不搞要强。因为“竹头木屑，皆为有用”（陶侃语）。这些琐碎的东西，说不定有时也用得上。例如在历史博物馆里要挂洪秀全的像，那就不用得上了。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我很赞同这段话。当然，这种做法不能提倡，不能把很多的人力放在这些方面，要引导大家从大处着眼，把精力集中在大的事业上。

占有和整理了史料，如何运用它们，这是历史研究中更重要的问题。有了史料，如果没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处理研究，好像炊事员手中有鱼、肉、青菜、豆腐而没有烹调出来一样，不能算作已经做出了可口的菜。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用大量的史料来具体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今天我们很幸运，研究历史有了极重要的方便条件，因为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中已很扼要地说明了。我们根据马克思这一灯塔似的说明，就有可能批判地利用史料，编写出通史、专业史和其他历史著作来。

固然，史料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炊事员仅抱着一部烹调术，没有做出席面来，那算没有尽到炊事员的职责。由此看出，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因而，对搜集、考察史料的工作，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我们反对的是为考据而考据，以史料代替史学。但如有少数人一定要那样作，我认为也可以由他去，因为这总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要好一些。

四 历史人物的评价問題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同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一样,应该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进行研究。当然,我们要坚守我们的阶级立场,从事批判。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

根据这样的原则,我认为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紂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就拿殷紂王来说,许多史书上都说他是“暴虐无道”、“荒淫无耻”的昏君,好事不做,坏事做绝,简直要不得。但据现有的一些史料来分析,殷紂王倒实在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相貌也很端庄魁梧,并非如人们想像中那么狰狞可怕。他对中国民族的发展,做了一些好事,对古代中国的统一,有不小的功劳。提到古代中国的统一,人们很容易想到秦始皇。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古代中国归于一统是由秦始皇收其果,而却由殷紂王开其端。

殷紂王曾经平定了东夷。东夷是长江流域的先住种族,在殷代末期有很大的扩张,发展到了淮河流域,甚至到了现今的山东地带。殷紂王费了很大的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俘虏了“亿兆夷人”作自己的军队,而周武王却结合起西南和西北的其他种族来打他的后路,结果由于俘虏兵掉头而使殷紂王失败了。但殷紂王虽然失败了,他所开拓出来的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却成为宋、楚、徐(殷人的直系或同盟种族)的根据地。周人因袭着殷代的文化在北方发展,宋、楚、徐等国承继着同一文化在南方发展。西周几百年

間，南北事實上是敵對的。但到春秋時代便逐漸形成了合流的形勢。文化是同出于—源，故在春秋時，中國的南北事實上已經是“車同軌、書同文”了。由古代萬國而十二諸侯而七雄並列而大一統，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故中國的統一是殷紂王開其端，而秦始皇收其果。

史書上所以記載殷紂王“暴虐無道”等等，可說是受了周朝反宣傳的影響。關於殷紂王的翻案，我在《青銅時代》里《駁〈說儒〉》中有一段文字，似乎可供參考。

評定歷史人物的作用，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不夸大、也不縮小。人們對各朝各代的帝王，往往容易一概否定，其實這是不妥當的，應該具體分析。有些帝王，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甚至如康熙、乾隆等，對民族、對經濟、對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當時是有過貢獻的，我們就應該給以一定的地位。

除去對歷代帝王應該這樣考察以外，各個時代中有关思想、文學、科學技術方面的人物，尤其應該正確地估計他們的作用，加以重視。過去的历史書，在這方面的注意是不夠的，一般都是偏重在政治方面的記述，對文化發展的情況写得不多。特別是對科學技術方面的杰出人物的敘述，顯得尤其貧乏。過去的史學家沒有重視這些，也不必責怪他們；可是今天我們的新史學工作者，却不能不加以重視了。

1959年3月21日

《《新建設》1959年4月号）